

文化被视为人类跨越自然的实力或从力量王国奔向自由王国的中介,它历来被赋予一种超自然、超物质、超实力的精神特质。具体地说,文化作为人类自己创造的符号表意系统,它总是指向社会的一种高雅和精神性的目的,而政治、经济、军事、贸易、外交等似乎都被视为是达到这种高雅的精神目的的手段而已。原因不难理解:文化更多地被理解为特定时代精神或理智发展的最高境界或水平的标尺。由此,文化总有种超越于具体“物”之上的高雅精神特质,“要追求文化内涵”。文化正是要通过创造符号表意系统,去追寻超越于具体“物”之上的精神内涵或内在意义。如果说,自然代表人类的外化的、实力的或物化的状态,那么,文化则代表人类的内化的、精神的或心灵的状态。

但是,近十年的艺术新景观,却让我感受到文化的某些与此不同的别样风貌:文化似乎正越来越经常地和偏好地指向它原本应当尽力超越的现实的“物”,并且还竭力展示它的影响现实生活的“实力”,而非原本被强化的精神之力。马克思早就揭示商品社会中劳动关系已被商品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结晶。美国现代哲学家路易斯·芒福德说:“城市是用来流传人类文明的成果的。”然而,近半个世纪,在“经济增长”和“GDP主义”的狂热追逐下,城市化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速度大兵团、成规模地推进,“人类文明的成果”是否能流传,成了一个悬念。

放眼神州,到处都是推土机和吊车奔驰的身影:大规模的城市拆迁与农村征地运动形成了一股狂潮。很多城市的改造或扩张面积动辄几十平方公里,有的甚至要把半个城市都拆掉。这一点,3月25日联合国发布的《世界城市化展望2009年修正版》有佐证。报告称,中国是在过去30年中城市化速度最快的国家。全球拥有5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中,四分之一都在中国。

中国无可置疑地成为全球最大的拆迁工地和建筑市场。然而,如脱缰之马的圈地运动和城市化进程,真的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了吗?

如果正视现实,我们就会发现一些不容回避的问题。

在城市,近日发布的一份名为《中产家庭幸福白皮书》显示,经济最发达的深圳、北京、上海、广州幸福指数最低,成为中产家庭心中“不够幸福”的城市。原因无外乎几个关键词:房价、交通、教育等。

对于房价,国外某媒体的一个标题很形象:《我听到年轻人在房价下呻吟》。现在北京的房价均价已经在3万元左右。一个年轻人要想在北京买一套房,需要不吃不喝干50年。这还是按90平方米以下、每月5000元以上的收入来算。成千上万的蚁民蜗居在低矮潮湿的出租房里“望房兴叹”。“在地铁站里要靠保安推才能挤进车厢。进去之后,被迫呼吸闷罐子里N合一的人肉气味,觉得自己逐渐变成午餐肉”。这是网友在博客里记录北京地铁的情景。

一方面是畸高的房价、拥堵的交通、高昂的教育成本,一方面是疏离的人际关系、巨大的生存压力、激烈的工作竞争,我们看到了一个个城里人面无表情、步履匆匆。逼仄的生存空间压迫着人们的情感园地,要么荒芜干涸,要么杂草丛生——发自内心的微笑已经成为珍稀表情——优雅、从容、美好,只能在街头巨大的房地产广告上美女的眉宇间寻找了。

联合国人居组织在1996年发布的《伊斯坦布尔宣言》中说:“我们的城市必须成为人类能够过上有尊严的、健康、安全、幸福和充满希望的美满生活的地方。”那么我们的城市怎样“成为人类能够过上有尊严的、健康、安全、幸福和充满希望的美满生活的地方呢”?一个睁眼就要算计今天必须挣够340元才够交按揭款,一大早就要打仗似地冲进人山人海的地铁站,到夜深人静时才可以把自己的躯体扔到潮湿的出租屋里的人,会感受到“尊严、健康、安全、幸福和充满希望”吗?会认为城市让他的生活更美好了吗?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作为一种理念很不错。关键是,城市让生活变得更美好?如果仅仅是土地供应方、官员、煤老板、温州炒房团、富二代和房地产开发商,如果市民和村民的生活因为城市化反而变得贫穷、拥堵和荒凉,那么,我们就很干脆地回答:这样的城市化,我们不要!

摘自《杂文月刊》第8期 含辛文

警惕奖杯上面的西方文化霸权

被称为“我国首部原生态电影”的《好大一队羊》是根据夏天敏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尽管影片相对于原著而言,苦难叙事有弱化的倾向,但是从整体看,还是属于“底层文学”叙事范畴。

《好大一队羊》在云南山区取景拍摄,“追求了无痕迹的原始的造型叙事”或许正是该电影的取胜之道。导演刘浩带着本片先后受邀出席多个国际电影节,并获得多项大奖。电影旨在以“实录”手法向国际影坛展示中国“当前”的农村生活。但影片的“底层叙事”显然不能作为中国当前农村生活的代表,更不能作为中国当前生活的代表。而“在国际影坛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霸权是将中国乃至东方编码在第三世界的文化等级中的”,“以西方他者的编码来看,中国的农村生活才能够代表中国生活的实质”。从这一立场看,电影提供给西方他者的是生活的“原生状态”,现实与作品的距离消失了,艺术的典型性减弱了,在这样的观赏过程中,形象失去了真实性。

从现实主义创作的立场上看,影片的现实性不足,这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影片对苦难叙述进行“泛化”的处理。第二,影片对苦难叙述进行“软化”处理,温和地对待“他人”的受难。第三,电影改编未能将原著寓言式的故事演绎成为真实的“现实生活”,不足以对电影文学与现实生活的正常关系给予有效的说明。影片的現實性不足,使影片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中国本土文化的真实性,其底层仍然是所谓的异国生活情调占主导地位。究其根源,与叙述者用“新奇”取悦国际影坛的理念有关。

影片在对苦难内部精雕细琢的同时,将主人公德山因生存苦难而凸显出生命的卑微用质朴来粉饰,以期取得一种“民族叙事”,而对于“质朴”表象背后的认知性——他从来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和别人的平等地位这种精神上的麻木却被忽略了。在国际影坛上,人们认为影片反映了中国社会的重要角色之一——农民,反映了他们的朴实和美好愿望,让世界更加真切地了解了中国(网络评论)。显然,“媚俗”的程度远远超过制片人原先的预想。同时,电影中人物很少用自己的眼光来看世界,容易丧失对“人”的价值尊重,而使人物从叙述者的角度陷入被动和卑下,从而也使观众——尤其是国际影坛的观众——因为缺乏可以沟通的共同的文化纽带,而带上居高临下的俯视姿态。当这样的影片在国际上频频获奖的时候,我们该警惕奖项之上的文化霸权主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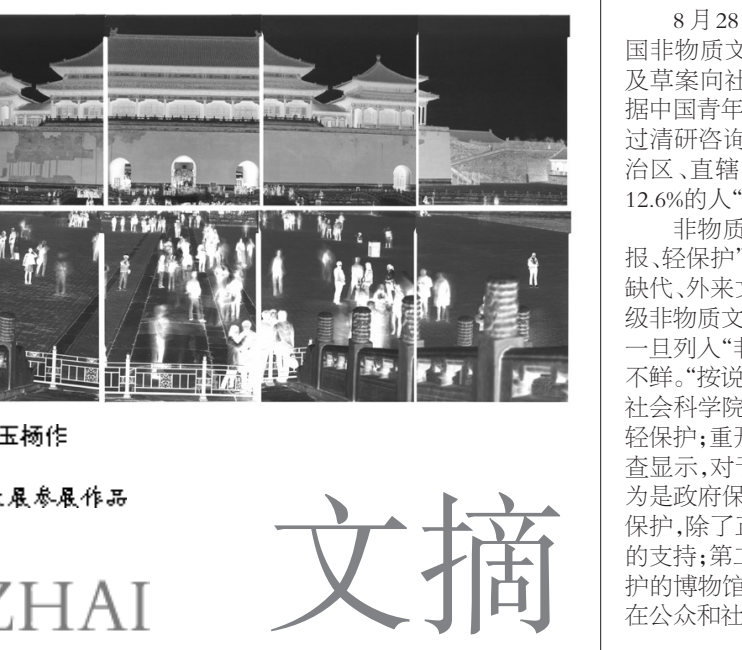
摘自《南方文坛》第4期 梁华文

艺术与文化的物化年代

实的“物”而赢得票房、收视率、上座率、销量等时,我们难道不正置身在文化的物化年代?只是这

里的“物化”(thingfication)与卢卡奇意义上的“物化”(reification)虽然在内涵上相互关联和延续,但所指已有重要变化了。如果说,物化在卢卡奇那里主要是说人与人的关系普遍地被演变成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那么,物化在我们这个年代则是指不仅劳动或社会关系被普遍地物化,就连原本以为可以超越于物化之上的文化也直指事物、实物、财物或东西本身了,也就是说连艺术符号表意系统的象征性或表征性也被实物化了或直指现实中的物或实物。艺术作为文化的主要形态之一,本来是要超越人类的自然或实物层面而提升到精神高度,但现在却反过来把人重新拉回到自然或实物层面。这样,作为市场经济时代的文化产业,艺术凭借商品、技术、身体等手段日益凸显“物”的诱惑力,从而越来越蜕变为与“物”纠缠不清的经济、产业、技术等行。面对这样的物化现实,当前美学及艺术学何为?问题就提出来了。

摘自《中国图书评论》第8期 王一川文



故宫午门(摄影)程玉杨作  
选自2010年第十届中国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参展作品

我们需要有理由的宽恕

菲律宾人质劫持事件刺痛了国人的心。之后,人们围绕“宽恕”展开了争论。

其实放眼舆论,中国民众这一次的愤怒是理性的。直到现在,这些愤怒不仅没有对中美关系产生巨大负面影响,反而会让一个国家在悲伤中更加成熟。

而反过来说,宽恕可以,但需要一个理由。这个理由不是我们自己找到的,而是菲律宾方面用实际行动提供给我们的。目前来看,菲律宾方面表达了一定的诚意。但是其解释还完全没有达到宽恕所需要的程度。真正的宽恕,应该是在合适的时候表达合适的情绪。在菲律宾国会的听证会上,从马尼拉市长到警察总监,都没法对此次人质劫持事件的解救工作做出合理的解释,甚至还有进一步的辩解或者推卸责任之嫌。的确,在今天的国际和国内社会,我们不能简单地用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来面对每一个问题。因为在社会的转型期,矛盾的出现有复杂的对象,比如此次

依法治理农村孩子辍学问题

依法治理农村孩子辍学问题遭遇法律“软肋”,政府难作为,家长想不通,孩子受侵害。看似简单的问题,实则挺复杂。

辍了学,不知道由谁来告,是最大的“软肋”。虽然有宪法和义务教育法、民事诉讼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但我国现有法律对辍学的诉讼主体仍缺乏明确界定。根据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提起诉讼的原告必须同被诉侵权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这就产生了一个悖论:侵害子女受教育权的父母不可能到法院去起诉自己。孩子又多是法律上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常常不能、不会、不敢去提起诉讼。在这种情况下,建议是否可以考虑修改现行法律,明确辍学事件的诉讼主体。

行政不作为、执法不严是造成农村学生辍学严重的又一“软肋”。现实生活中,因重大事故、事件、案件被问责的党政领导干部屡见不鲜,但因辍学事件被问责的却极少见。如果“引咎辞职”问责制能落到实处,解决辍学问题或许不再困难。

人大监督的缺位,也使解决农村学生辍学问题失去必要的制约。人大代表在一线,理应最了解基层包括农村孩子辍学的情况,各级人大对政府各项工作有监督权,有责任督促政府履行职责。尽管这些年,各级人大都进行了义务教育法或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执法检查,但成效仍不尽如人意。

当然,农村孩子辍学问题的根本解决,仅靠法制还不够,归根结底取决于农村经济的发展。但经济与教育互为因果,且教育居于优先地位。有的地方就善于通过各种方式,提高农民的教育意识。让农民自己教育自己,恐怕是解决问题的治本之道。

摘自《人民日报》9月1日 张烁文

孙见坤升学受阻刺痛了谁

凭借在国学领域的钻研精神和过人禀赋,陕西省西安市高三应届生孙见坤征服了复旦大学的教授们。为此,8位教授希望学校破格录取孙见坤。但因高考成绩6分之差,陕西省招办拒绝为孙见坤投名。

虽然处理此次事件的态度值得商榷,但陕西招办维护高考公平的初衷毋庸置疑。与其说陕西招办没有“网开一面”的勇气,不如说现行的招生和教育制度缺乏“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机制。

在注重均衡发展、紧盯考试成绩的应试教育体系下,严格的招生规则难以被改写。由此一来,孙见坤等心怀特长者之遭遇便不足为奇了。对于孙见坤的遭遇,国学大师钱穆的女儿、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钱易感叹道,正是在当时单纯而开放的教育体制下,她的父亲钱穆和堂兄钱伟长才有机会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不俗的成就。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当年钱钟书、吴晗和季羨林三位北大的高考数学成绩分别是15分、0分和4分。然而,“瘸腿”的成绩并未妨碍他们进入清华大学,得益于“兼容并包”,三人最终成为大家。反观今日,在惟分数论成败的体制下,只有突出特长而总体成绩不够的考生,恐怕难有理想出路。

在当今时代,一位高中生能甘于寂寞、置身于故纸堆里钻研,本是一件难能可贵、值得褒扬的事情。复旦大学对陕西招办好言相求,甚至不怕吃闭门羹,其背后是爱惜人才的责任感。遗憾的是体制不成全,双方只好抱憾叹息。

更令人担忧的是,今后还会有多少潜在的“千里马”遭此境遇?不尽合理的体制刺痛了少年的心。我们在对孙见坤的遭遇感到惋惜之际,更希望他的遭遇能够刺痛现行教育体制的神经,从而推动体制不断健全,在兼顾公平的同时真正做到兼容并包。

摘自《光明日报》8月30日 朱小龙文

新旧两版《红楼梦》谁更“忠实”

1987版电视剧《红楼梦》播出后,观众与专家指出的一个问题是“写实有余”而“诗意不足”。这其实也是时代潮流的影响。关于写实问题,导演王扶林在题为《荧屏(红楼),何以如此》的文章中表述了自己的创作指导思想,他认为小说中那些虚幻迷离的成分都是“假语村言”,揭露现实才是作者主旨,因此删去了女媧炼石补天、梦游太虚幻境等部分。同时,还删去了涉及“通灵宝玉”的“迷信成分”,却根据脂批增加了写实的“淫丧天香楼”。这样,“通灵宝玉”、“风月宝鉴”也就失去了其含蓄讽喻的象征意味。“诗意不足”不仅在于将女媧补天、太虚幻境等一概视为假语村言而舍弃,更在于舍弃了小说中很多结诗社、听昆曲等雅趣十足的情节,使得黛玉和一千红楼女儿的灵秀表现不够。

在这些问题上,新剧恰恰是可以自夸“忠实”的,剧中完整保留了小说原著中女媧炼石补天、宝玉梦游太虚、众姐妹结诗社等情节,也几乎没有增加什么原著中没有的内容。然而,新剧的问题也偏偏同样出在这亦步亦趋的“忠实”上。不仅人物对话从小说中照搬而未加润色,情节的取舍安排上也缺少章法。比如开头甄士隐的故事,不仅详细表现家人如何在元宵宵夜夫小解而丢了英莲小姐,连甄士隐的岳父都要花一番工夫来介绍,真是面面俱到,实在令人抓不住重点。又如探春“协理荣

非物质文化遗产流失首因是公众保护意识不强

8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草案)》及草案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据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清研咨询对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363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3.5%的人表示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12.6%的人“非常了解”,还有25.4%的人表示不太了解。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问题是什么?调查中,“公众参与不够”(72.0%)、“地方重申报、轻保护”(69.8%)、“缺乏立法保护”(69.3%)排在前三位。接下来还有:商业化严重、传承人缺代、外来文化和现代文化冲击、宣传力度不够、缺乏专家参与、保护无序、资金匮乏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审专家委员会主任冯骥才说,目前不少地方官员把“非遗”看成文化政绩,一旦列入“非遗”名录,也会给当地带来巨大的旅游效益,所以全国各地花巨资申遗的现象屡见不鲜。“按说进入‘非遗’名录,就应该有更严格的保护,但现实情况往往成了保护的结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朝戈金认为,“非遗”保护的主要问题是“四重四轻”:重申报、轻保护;重开发利用,轻深入研究;重经济效益,轻文化内涵;重一时举措,轻长期规划。本次调查显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流失的原因,85.5%的人首选“公众保护意识不强”;74.7%的人认为是政府保护力度不够。冯骥才认为,国家的“非遗”保护目前已经形成了体系。首先是政府保护,除了正在完善的法律之外,还有国家对“非遗”的认定,认定之后政府会对传承人有一定的支持;第二是专家保护,帮助政府和社会认识到非遗的意义;第三,很多城市建立了“非遗”保护的博物馆。朝戈金认为,“非遗”保护的主要责任在政府,但是从深层次和长期角度看,责任在公众和社会。

摘自《中国青年报》8月31日 王聪聪文

养生该信谁

“神医”唱罢,“神道”登场。李一很出名。但是,他的出名却是以特异功能的行骗手段来完成的。所以,打倒李一,对于一些部门来讲是义不容辞的。一方面,打倒江湖骗子,破除社会迷信;另一方面,还老百姓一个干净看病空间,就是所谓的净化社会空气,更要让李一们的粉丝赶回到正规医院去看病。

在“强奸罪”的名义下,相信李一也没什么蹦跶的兴头了,继而,他从此就可能退出我们所有人的视野。只是,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在科技文明、法治文明如此发达的今天,老百姓总喜欢相信“江湖骗子”呢?为什么我们周边的“神医”、“神道”总像“打地鼠”游戏一样,打完一个又冒出一个?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根绝江湖骗子呢?果真是因为我国民众愚昧、热爱迷信、如梁启超先生所说的“民智未开”吗?

需要明白,信张悟本、李一的人中,有不少是高学历的精英人才。所谓“民智未开”,放到百年之前说可以,放在现在说,不可以。更主要的问题是,公众的信仰永远是守恒的——正如古人讲的“远虑”与“近忧”的关系一样,公众信仰“江湖骗子”的同时,定然对该信仰的东西有所怀疑。即体制之内该给老百姓以健康的所谓医疗,已经失去了本应有的市场和公信力。

面对养生,我们该信谁?根本上讲,我们该信现代医学,该信“人民医院”,更该信时下比较热议的新医改,但是,现实的境遇却是,公众基本上不选择信以上三者。究其原因,不过是“看病贵”“看病难”六个字。

具体说来主要是,我们是该信大医院,可老百姓手里的钱不让我们信大医院,于是我们只能信“吃绿豆”“吃茄子”;我们是该信小医院,可把时间都花在排队、排号上的患者,就会感觉还不如找个“民间方士”、“民间土士”瞧瞧气色;我们是该信发达的医学科技,可医疗设备的过于集中、过于垄断,让普通百姓望尘莫及,相信廉价一点的“江湖骗子”也就成了一种可行性选择。

“江湖骗子”一个一个被击倒了,但滋生“江湖骗子”的土壤仍然存在。而且,土地肥沃,阳光、水分充足。从这个角度讲,回答公众在医疗卫生问题中的“该信谁”命题,远要比打倒李一更重要。“该信谁”的问题解决不了,李一就绝不会是一个人在战斗,还可能会出现李二、李三、李四、……

摘自人民网8月17日 王传涛文

西方与第三帝国:理性对“浪漫”的误读

德国人被公认为是理性的民族。但是,如果对于历史上德国人的精神轨迹做跟踪考察可以看到,所谓德国人的浪漫气质其实更加深沉,后果也更加严重。从十八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叶,一旦涉及政治和意识形态,尤其是涉及国家、民族、世界观等问题时,德国人便不再冷峻,而是激情澎湃。德国人的浪漫精神之于纳粹,犹如德国历史之于第三帝国,其中的关系复杂。纳粹产生于一个特殊的时代和特殊的环境,是前现代的民族观念、种族主义、战败的耻辱、凡尔赛条约的重负、世界经济大萧条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与德国历史、文化的纠葛错综复杂。西方对德国人的浪漫气质有了了解,大可值得怀疑。诺伯特·埃利亚斯在《德国人研究:德国十九和二十世纪中的权力斗争及习性发展》剖析了西方对于纳粹德国的误读。

埃利亚斯认为,“二战”前西方国家领导人德国最大的误读,是透过理性的眼镜来看待德国。他们都是透过利益的眼镜来看待和解决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信仰、信念等精神层面上的事物不可能超越实实在在的国家利益。同样在与第三帝国的关系中,西方的功利思维、工具理性始终未能看

透纳粹领导层的心态,即一种宗教式的世界观、为实现“德意志民族使命”而怀抱的使命感。纳粹德国的政治与宗教精神纠缠在一起,表现为“信仰”。西方对纳粹领导层的误读,在种族灭绝问题上体现得最为清楚。战争爆发前,西方国家认为纳粹德国的种族主义宣传和排犹其实是功利行为,是纳粹在用犹太人问题与西方讨价还价,通过犹太人问题来要挟西方,迫使西方作出让步。但究其根本,纳粹的屠犹是出于一种种族主义的信仰,而这个信仰的心理和情感基础显然在于德意志民族的“浪漫情怀”。尽管埃利亚斯并未把非理性的信仰视为纳粹整体行为的终极原因和动力,但是在某些事件如纳粹的屠犹行径中,在他看来这个信仰的确是首要原因;而纳粹德国的精英则虔诚地相信他们的理念,忠于其信仰,为之可以不惜任何代价,这在西方是不可思议的。

当今德国人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也不一致,德国新保守主义历史学家就认为,纳粹的屠犹并没有一个通盘完整的计划,而是机会主义的,取决于德国国内和国外的具体情况。

摘自《读书》第9期 李伯杰文